

自媒体时代的写作还能产生经典吗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写作生态,同时也加剧了阅读与思考的分离,写作的趋利性色彩也更加明显。今天,我们请来青年批评家杨庆祥作为对谈嘉宾,与主持人育邦一起探讨“自媒体时代的写作”的特点,自媒体时代对于文学创作产生的深层次的“化学反应”,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秉持何种态度,“纯文学”扭转“弱势”的可能性,以及作家和时代之间深切的“交互关系”。

对
话

自媒体时代对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育邦:众所周知,网络的出现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将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信息高速公路,成为人类信息传输方式的第三次大变革。网络兴盛以来,出现了以快捷消费为特征的网络文学。似乎截然不同于传统文学,或者说纯文学,随着手机客户端的兴起,每一位作者在自媒体中能找到自己存在的空间和位置。自媒体时代的写作在内容生产和传播上已与过去大为不同。

杨庆祥:自媒体时代给了写作者一定的机会,看起来写作变得更加容易,继而更加普遍了,但同时应当看到是,正如你所说的,自媒体时代的写作是以“快捷消费”为特征的,消费的主体是读者,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作者以读者的审美趣味为导向,读者快餐式的阅读很可能会加剧阅读与思考的分离,使作者的写作体现出更多功利性和大众化倾向。

同时,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表面上看起来,每一位风格不同的作者都能在自媒体写作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位置,但是实际上,如何在一个以读者阅读数据为反馈的写作机制中坚守自己的风格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实际上,自媒体时代对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人人都可以成为写作者,那么真正优秀的写作者必然需要更高的素质。如何在多元的阅读需求面前找到自己,坚持真正的个人性,理清写作的意义和价值,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育邦:以诗歌为例。诗人曾经是“未被承认的人类立法者”,甚至还是“世界的推动者和塑造者”。1980年代以来,诗人们乐于表现为狂热的“立法者”和“启蒙者”,但这种表现是表面化的。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中,他们不断地强化自我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位置感,不断要求实现作品的经典化和历史化。他们以相对进步的价值观来映射一个时代的变迁。甚至在这一过程中,诗歌作品普遍流露出崇高、抒情和想象的特征。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网络兴盛以后,诗人的身份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从强力介入社会的“立法者”和“启蒙者”转变为面目模糊的自省者、自我实现者。

在社会层面上,越来越要求诗人成为一名有正常政治诉求、物质诉求和精神诉求的合格公民,即从“神”“时代骄子”走向“平民”,成为公民社会的一份子。在传承遗产和传统的要求中,诗人是否可以归结为

传统意义的文人呢?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杨庆祥: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依然是以“精英作者”自居的。1980年代诗人的身份意识和自我想象有点像是传统文人和现代批评知识分子的合体。我并不认为这种身份意识就完全过时了,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真正优秀诗人的必要精神构成元素。不过这些不能是全部,否则就无法适应以互联网为主导形态的当下社会,“精英意识”和“平民意识”并不矛盾,做一个“普通的英雄”是波德莱尔以来现代诗歌的基本准则。

育邦:“文人”显然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朱利安·班比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忠实于理想,我以为这对于人类的道德是必要的(对于人类的审美,更是如此)。”“知识分子”需要实现“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的悖论统一。班比也认识到“知识分子事实上也食人间烟火,对于实践利益也有感触。”“轻视人间的幸福,高扬某些知识分子的价值,特别是公正价值,这些人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那么他们也不是知识分子。”——这里他无非在说明知识分子也是人,就如同说佛陀首先是人一样。知识分子难道也是彼岸的向往吗?像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样,知识分子的理想世界必须是现实生活价值的对立面吗?它摒弃对生活的种种傲慢之举,摒弃现有的共同的世俗价值理念,只能去践行彼岸的生存方式。知识分子要“把真理置于现实的利益之上”。

“纯文学”的“弱势”并不是网络文学兴起所导致

育邦:姚斯的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作品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要在读者阅读中实现,而实现过程即是作品获得生命力和最后完成的过程。读者在此过程中是主动的,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

现在的客观事实是,网络文学的读者数量远远大于以期刊与书籍为阅读媒介的传统读者,但它不幸地处在“文学鄙视链”的末端。在整个文学生态中,所谓“纯文学”的受众面和影响力似乎也日趋下降。读者也主动参与了很多网络文学的“创作”,而“纯文学”领域基本上靠作者“自身的天才”属性苦心造诣、独自创作。

杨庆祥:我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并为“纯文学”的“弱势”而感到痛心疾首,但是我现在认为,这不是一个网络文学兴起之后才导致的现象,阅读和思考的分离是古已有之的,思考永远属于小众群体。这种观点

虽然有文化精英主义的倾向,但是我认为无法强迫网络文学读者参与到“纯文学”的阅读和写作中,也无法使“纯文学”爱好者投身到网文的阅读中,因为本身这两个读者群体的阅读目的就是截然不同的。

或许,“纯文学”也可以不再以期刊和书籍为主要载体,转而移步网上,但是它的受众数量也依然不会因为传播媒介的变化而扩大,反而很可能在对读者口味的迎合里失去自我。网络文学与纯文学互相排斥的现象很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纯文学可以从网络文学的借鉴中获得某种思维上的活跃和时代感,网络文学的质量也有以纯文学为标杆的可能,也可以理解为一定意义上的互相成全。

育邦:在今天,作家面临着新的变革,无论是物质、社会层面上,还是精神、心灵层面上,都是如此。我甚至愿意引用瓦莱里在20世纪早期说过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不幸——或极大地不幸——面临人类活动及生活本身的一切境况的一场深刻、迅猛、不可抗拒和全面的变革。”我想,在21世纪的中国,变革更甚。因而作家们面临着更丰富的题材资源,但是同时也是陌生的挑战。

杨庆祥:时代变革确实会让作家面对更加丰富的写作资源,但是这只是说作家所面对的外界环境发生了变化,并不一定会让作者的写作比过去更有优势,毕竟文学创作的本质是向着人类精神腹地探索的过程,虽然社会的巨大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向生命征伐的图景更加鲜明,但是作家如何不迷失其中,如何保持抵抗的姿态,去写出精神性的探索才是关键。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写作应当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发现,而不是精神层面的重复。

很多小说的内容是写时代变革的,这些小说虽然涉及了最新的社会现象,但是并没有获得精神层面的超越性,也就是没有米兰·昆德拉所描述的小说历史的延续性,这样作品就很难成为经典,所以,作家如何透过纷繁复杂的题材资源看到故事更深层的灵魂,如何把握时代的脉搏,又不被预设的主流思潮所束缚,是一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

就像海德格尔说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世界并不是一个被人观察审视的对象,它是人的一部分,是人的维度。时代发生变化,身处其中的人也会变化,同样,作品也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呈现不一样的风格。但这并不代表时代与作品的变化是一一对应的,很多作品是超越时代凌驾于作品之上的。



育邦

1976年生。从事诗歌、小说、文论的写作。著有诗集《体内的战争》《忆故人》《伐桐》,小说集《再见,甲壳虫》《少年游》,文学随笔集《潜行者》《附庸风雅》《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等。现为《雨花》杂志副主编。



杨庆祥

1980年生。批评家、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青委会委员。出版有思想随笔《80后,怎么办》,诗集《这些年,在人间》,《我选择哭泣和爱你》,评论集《社会问题和文学想象》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日、俄、韩等多种文字。

网络时代广泛传播的作品可能抵挡不了时间的淘洗

育邦:每一位作家都渴望契入自己的时代,但同时也惧怕时间无情的审判,渴望作品的永恒性。在他们面前,如何成为一个进退有据的“同时代人”是一个难题。正如阿甘本言:“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相关的。但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因此,同时代性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

杨庆祥:过于认同某种社会形态是危险的,同样,过于沉浸和认同所处的时代也是危险的,这是因为预设的思维框架会形成认知的偏颇,形成偏见,使我们不能更客观的接近时代的真相。这个问题不局限于“同时代”,在观看任何一个时代乃至时代中的事物时,都要把握认知的距离,保持冷静和疏离。

育邦:我们似乎永远都处在“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差的时代”悖论之中。但是,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属于自己时代的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一代又一代有创造力、有独特艺术价值的作品将会以垂直传播的方向获得流传,并不断扩大其影响,甚至最终成为经典。自媒体时代正为此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

杨庆祥:自媒体时代为文学作品传播的广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某些作品的读者数目可以达到一个想象不到的量级。但是便捷带来的往往不是深刻,倾向于使用便捷的途径获取资源的人往往缺失某种深耕的精神,简单地说,就是会怕麻烦,对事物的思考流于表层。

这样的特质带来的危险是,网络时代广泛传播的作品未必能够具有精神乃至灵魂层面的穿透力,它们抵挡不了时间的淘洗,也难以成为经典;反过来,具有思想上的超越性的作品,又由于其需要深刻的思辨而难获自发性的网络层面的广泛传播,所以尽管网络使传播变得便捷,在自媒体网络时代的作品经典化方面,我的看法是悲观的。